

## 第二章 三民主義教育之實施、變革與檢討

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教育體制的建立，最早可追溯至民國十七年完成北伐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即頒布「各級學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通則」，其中第一條規定：「為使本黨主義普及全國，並促進青年正確認識起見，各級學校除在課程內融會黨義精神外，須一律按本通則之規定增加黨義課程」。於是全國各大學先後紛紛設置「黨義」為正式課程。「黨義」即為最早在大學設置之「三民主義」課程（黃人傑，1987：1）。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實施方針」，曰：「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自此確立了以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教育宗旨。（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5）

民國二十三年，國民政府公佈公民科課程標準後，把黨義與公民合而為一，此時公民課程內容，實以三民主義為主，故此時期之公民課程可視為三民主義課程之前身。到了民國二十八年，教育部又將各大學之「黨義」或「公民」課程，改名為「三民主義」。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更將「三民主義」定為大學共同必修課程。（黃人傑，1987：1）不過，這一課程一直是備受爭議的，反對者視之為國民黨從事「黨化教育」的一個工具，「學術性」有限，「政治性」卻很強，有違學術自由精神。部分自由主義學者如任鴻雋、蔣廷黻、傅斯年、陳序經等，都曾在《獨立評論》中撰文質疑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張亞雲，1989：55-56）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退居台灣後，蔣中正宣稱過去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是因為沒有確實實行以三民主義為教育中心的思想所致，因此復又在台灣的大專院校與高級中學恢復三民主義課程的教學。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十五日，教育部頒佈「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首先加強中小學公民史地及專科以上學校「三民主義」之教學，除了恢復大專之「三民主義」課程，並規定在高中三年級亦講授

三民主義。(黃人傑，1987：25)此綱領中「關於加強三民主義教育」者，計分四項(呂寶水，1962：271)：

- 1.加強中小學公民史地及專科以上學校三民主義之講授。
- 2.各校敦請名人講演，闡發三民主義思想及戡亂建國之意義。
- 3.中等以上學校舉辦三民主義論文比賽，並組織學術團體研究三民主義。
- 4.出版有關三民主義及有關反共抗俄之刊物。

自此至解嚴前，三民主義作為一種「反共抗俄」、「反共復國」教育的基調沒有太大轉變，其「思想教育」的特質，也因將三民主義教學隸屬於「教育部訓育委員會」職責之下而更形彰顯。<sup>1</sup>

## 第一節 高中三民主義課程

### 一、三民主義課程的實施

高級中學三民主義科自民國四十二年正式增設。教育部認為此乃是「鑑於民國二十一年公佈之中學課程標準，將『黨義』一科改為『公民』，並將『三民主義』的教材份量減少後，對於學生思想訓練似嫌不夠，而於反共抗俄工作多有影響，為適應當前需要，決定將該科課程標準，予以恢復。」因此，自民國四十二年，高級中學正式增列三民主義一科，列在第三學年教學，每週兩小時，高中一、二年級則開設公民課程。(教育部編，1996：847)

從民國四十二年至今，教育部共計公佈了五次(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分別是民國五十一年公佈「中學課程標準」，民國六十年為配合國民中學首屆畢業生

---

<sup>1</sup>教育部於民國三十四年設立訓育委員會，負責策劃改進各級學校之訓導工作。遷台之初該會曾一度撤銷，但隨即於民國四十四年八月間恢復設置訓育委員會，繼續策劃各級學校之訓導工作。中等學校三民主義教育與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課程教學均屬訓育委員會的職責下。(中華民國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1437-1439)

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民國七十一年為配合高級中學法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最後一次則是在解嚴後，教育部於民國七十九年元月十一日成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歷時近六年完成，於八十四年公佈新修訂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在三民主義科課程標準方面，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教育部聘請三民主義教育專家盧紹稷起草「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程標準」草案，並召開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sup>2</sup>，於民國四十三年一月公佈實施。（教育部編，1996：847）此後，即由歷屆「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三民主義科小組修訂委員」參與編審<sup>3</sup>。三民主義課程教學實施上較大的變化，是在八十四年修定新課程標準後將三民主義改至一年級教授，原列高一、高二公民課程改列為高二、高三。這種轉變是解嚴之後三民主義面臨廢考、廢教壓力下，降低三民主義課程重要性的一種展現。

教育部公佈之課程標準，係針對高中各科目之教學目標、時間分配、教材大綱與實施方法等四大項目的指示。三民主義科在這五次的課程標準中，其教學目標轉變如下：

表 2-1：歷年高中三民主義課程教學目標

	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程教學目標
民國四十二年	(一) 瞭解三民主義之基本要義。 (二) 明瞭實施三民主義之基本方法。 (三) 認識三民主義及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之關係。
民國五十一年	(一) 明瞭三民主義的基本要義及其實施方法。 (二) 明瞭三民主義與各種主義的異同，以加深對三民主義的信仰。 (三) 認識三民主義與復國建國的關係，以增強反共抗俄的實踐。

<sup>2</sup> 參加此項審查會議者為：鄭通和、崔書琴、吳英荃、任卓宣、羅剛、葉守乾、盧紹稷、萬子霖。

<sup>3</sup> 歷次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三民主義科小組修訂委員為：(五十一) 楊希震、任卓宣、羅剛、張鐵君、何浩若、袁世斌、傅啓學、葉守乾、萬子霖、劉英士、王亞權、吳英荃、朱 春、郁漢良、吳子我、陳如一、雷震邦、鮑家驄。(六十) 崔載陽、任卓宣、葉守乾、崔垂言、楊希震、熊堂萱、辛志平、周世輔、張鐵君、羅剛、聶英、單仲範。(七十二) 周應龍、王冠青、朱堅章、周世輔、馬起華、郭柱、張亞濤、黃良弼、賀凌虛、齊祖智、楊樹藩、蔡鐘雄、魏萼、蕭行易、盧增緒、王建。(八十四) 朱謙、吳家胤、林有土、周陽山、卓播英、郭柱、崔垂言、陳光輝、陳宏州、彭立忠、彭逢效、黃人傑、黃振涼、葉日陞、龔金助。

	(四) 認識三民主義與各學科的關聯以明瞭三民主義在課程中的重要性。
民國六十年	(一) 瞭解三民主義的基本要義及其實施方法。 (二) 瞭解三民主義與現代世界思潮的關係，以加深對三民主義的信仰。 (三) 認識三民主義與復國建國的關係，以增強反共抗俄的實踐。 (四) 認識三民主義與個學科的關係，以明三民主義在課程中的重要性。
民國七十二年	(一) 瞭解三民主義的基本理論及其實行方法。 (二) 瞭解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及三民主義與現代世界思潮的關係。 (三) 認識三民主義與復國、建國的關係。 (四) 認識三民主義救中國、共產主義禍中國的道理。 (五) 三民主義與國家政策及現行建設相結合。
民國八十四年	(一) 認識三民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及時代背景。 (二) 瞭解三民主義與相關主義及學術思潮的發展。 (三) 明瞭國父建設現代化中國的理論及實行方法。 (四) 建立共同參與建設現代化中國的信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考教育部編印，「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綜觀上述教學目標的設定，皆是強調對三民主義的信仰，以及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民國七十一年起除不再「抗俄」之外，較大不同之處是加入了「三民主義與國家政策及現行建設相結合」一項，以突顯政府的「德政」，強調建立台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種轉變明顯是針對當時台灣內、外局勢變化所作的修正，企圖爭取人民對國家施行三民主義“成功”的認同。不過，此舉卻招致「使三民主義課程流於政治宣傳，損害三民主義的學術性」的批評。(朱謨，1993：17)

大抵而言，七十二年以前的課程標準是承續政府遷台後反共復國的國策而來，(黃淑芳，1996：70)八十四年課程標準修訂之時，台灣已解除戒嚴，對三民主義課程的批評聲浪紛至沓來，三民主義科課程修訂小組歷經八次研究會議，在修訂過程即已強調：教材綱要以建立三民主義學科之學術性為原則，避免國家政策及政府建設等政治性之內容，並增加三民主義相關思潮之介紹，使學生認識三民主義

在近代思潮中之地位。(教育部編，1996：897)此外，有別於七十二年(含)之前公佈的四次課程標準，皆明定「本科教師應酌量加授有關三民主義的補充教材，如先總統 蔣公所著『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程序』、『反共抗俄基本論』、『建國運動』、『青年守則』、『反共抗俄的工作要領和努力方向』等重要著作，以補課程之不足。」(教育部中等教育司，1983：68)八十四年之課程標準則強調「本教材編輯以 國父著述為主」。(教育部編，1996：88)顯見教育部有意修正過去三民主義教材充斥蔣中正言論的現象。由八十四年課程標準的轉變，亦可推知解嚴後相關人士試圖對三民主義科目的重新定位。

若就教材大綱觀之，根據這五次課程標準訂定之教材大綱，其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章教材綱要如下表所示：

表 2-2：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教材大綱

	民族主義	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	其他
四十二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族主義要旨</li> <li>2. 民族構成的要素</li> <li>3. 民族地位的恢復</li> <li>4. 民族主義與反共抗俄</li> <li>5. 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比較</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權主義要旨</li> <li>2. 民權的發展</li> <li>3. 自由與平等</li> <li>4. 權能區分</li> <li>5. 政權與治權</li> <li>6. 民權主義與極權主義之比較</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生主義要旨</li> <li>2. 平均地權</li> <li>3. 節制資本</li> <li>4. 發達國家資本</li> <li>5. 食衣住行育樂</li> <li>6.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比較</li> </ol>	
五十一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族主義的概念</li> <li>2. 民族構成的要素</li> <li>3. 民族精神與民族地位的恢復</li> <li>4. 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li> <li>5. 民族主義與個人主義</li> <li>6. 民族主義與階</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權主義的概念</li> <li>2. 革命民權與天賦人權</li> <li>3. 自由與平等</li> <li>4. 權能區分</li> <li>5. 五權憲法</li> <li>6. 均權制度</li> <li>7. 民族主義與極權主義</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生主義概念</li> <li>2. 平均地權</li> <li>3. 耕者有其田</li> <li>4. 節制資本</li> <li>5. 發達國家資本</li> <li>6. 食衣住行問題</li> <li>7. 育樂問題</li> <li>8. 民生主義與資本主義</li> <li>9.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li> </ol>	

	級鬥爭			
六十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族主義概說</li> <li>2. 民族主義的恢復</li> <li>3. 民族地位的恢復</li> <li>4. 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權主義概說</li> <li>2. 革命民權與天賦人權</li> <li>3. 民權主義的自由</li> <li>4. 民權主義的平等</li> <li>5. 權能區分</li> <li>6. 五權憲法</li> <li>7. 民權運動的演進</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生主義概說</li> <li>2. 平均地權</li> <li>3. 耕者有其田</li> <li>4. 節制資本</li> <li>5. 發達國家資本</li> <li>6. 食衣住行問題</li> <li>7. 育樂問題</li> <li>8.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li> </ol>	結論部分增列「三民主義的實踐」一節
七十二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族主義概說</li> <li>2. 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li> <li>3. 民族的危機與民族地位的恢復</li> <li>4. 民族主義的基本主張</li> <li>5. 民族復興運動的要務</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權主義概說</li> <li>2. 自由與平等</li> <li>3. 民權主義的特質</li> <li>4. 五權憲法</li> <li>5. 民權運動的演進</li> <li>6. 民權運動與西方民主政治的比較</li> <li>7. 我們的政治建設</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生主義概說</li> <li>2. 民生主義的辦法</li> <li>3. 發展經濟的基本原則</li> <li>4. 民生問題的解決</li> <li>5. 共產主義不能解決民生問題</li> </ol>	增列「三民主義的趨向與目標」一章，宣揚「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八十四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族主義概說</li> <li>2. 民族主義與民族革命運動</li> <li>3. 民族主義的基本主張</li> <li>4. 民族主義與相關思潮</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權主義概說</li> <li>2. 民權主義與民權革命運動</li> <li>3. 民權主義的基本主張</li> <li>4. 五權憲法原理</li> <li>5. 民權主義與相關思潮</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民生主義概說</li> <li>2. 民生問題與社會革命運動</li> <li>3. 民生主義的基本主張</li> <li>4. 民生主義與相關思潮</li> </ol>	以「三民主義與國家發展」為結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考民國四十二、五十一、六十、七十二、八十四年公佈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從以上三民主義教材大綱的增刪，可看出其主要差異為：民族主義部分，自

五十一年起不再專章討論「民族主義與反共抗俄」的關係，不過，這僅是將反共抗俄的精神分散至各章節。批判「俄帝」在教科書中的確漸漸不再強調，但「反共」則一以貫之。以民國七十二年所增列之「民族復興運動的要務」一章為例，其細目即是要「加強民族團結、堅持國際正義、完成反共大業、促進永久和平。」（教育部中等教育司，1983：59）八十四年教材大綱修訂時，不論台灣內部或兩岸關係都與之前大不相同，民國八十一年更已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民族主義教材大綱自也順應時局刪除了民族復興運動及有關反共大業的內容。

民權主義部分，民國六十年以前教材大綱以介紹民權主義基本理念為主，所列「民權主義與極權主義」一章，主要目的仍是在批判俄帝及其附庸“朱毛奸匪”。七十二年起增加了「民權運動與西方民主政治」以及「我們的政治建設」兩部分，是企圖以台灣的政治建設，對比“共產專政的罪惡”，這種選擇性的對比在八十四年教材大綱中亦遭刪除。

民生主義方面，除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及六大需求等基本主張的介紹外，民國四十二年、五十一年與六十年的教材大綱列有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的比較。七十二年後不再做民生主義的比較研究，但不忘以民生主義批判共產主義的謬誤，以及強調「共產主義不能解決民生問題」。民生主義教材大綱一向強調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性，這與孫中山所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顯有不同。八十四年起，民生主義與其他主義的比較改以中性的「民生主義與相關思潮」名之，以突顯其客觀性、學術性。

此外，其他主要差異尚有：六十年起在結論部分增列「三民主義的實踐」一節，以標榜台灣是三民主義模範省；民國七十二年由於蔣經國已喊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因此教材大綱特於結論部分大書特書台灣的政經建設，強調三民主義是世界潮流的趨向，以及如何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相較之下，八十四年之課程標準明顯地向台灣回歸，不再提統一中國，轉而強調三民主義的國家發展理念以及三民主義與台灣經驗。

綜合言之，三民主義教材受現實政治因素影響極大，可隨時為執政者的需要而量身定作，這使它淪為服務當權者的工具，不復見原本的內涵與精神。如陳伯璋所批評的，教育部頒定的三民主義課本超越國父學說而自我發皇處很多，「經典」（即《三民主義》）被肢解而用來解釋一家之言（幼獅版課本），其實施的結果，卻造成學生對立國理想的誤解或反感，而以考試為約制的工具，也更增添反動的成分，這與正式課程所要達成的目標已相去甚遠。（陳伯璋，1988：228-229）八十四年起，三民主義課程的修訂朝學術化方向努力，企圖擺脫過去的政治教條，改以認識三民主義的形成背景與基本理念為主，以使學生具備基礎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觀念。這種修訂方向其實是將三民主義修正為一種「公民」教育，在高中已有公民課程下，三民主義也就不再具有獨立設科的需要<sup>4</sup>。解嚴之後，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此時正是可以擺脫過去政治力對三民主義教材與教學的干擾，恢復三民主義原貌之時。不過，若從實際教科書的編寫可發現<sup>5</sup>，強調「學術化」的結果，三民主義更像是對眾多思潮的導讀之一，易言之，此舉似無助學生了解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原貌。

## 二、三民主義教科書的編定

三民主義課程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設科教學起，其教科書先採審查制，由各書局依據「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程標準」所列「教學大綱」編輯教科書，經國立編譯館審查通過並報呈教育部核定後印刷發行，是為「審定本時期」。至四十四年八月底止，經審查合格之高中三民主義教科書共計四冊。民國六十年二月，教育部公佈「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程標準」後，高中三民主義教科書改由國立編譯館設置之「高級中學三民主義科用書編審委員會」負責主編，正中書局及幼獅文化公司聯合印行，至此三民主義科亦進入「標準教科書」時期。<sup>6</sup>（朱謙，1993：

<sup>4</sup> 根據最新「高中課程暫行綱要」，自九十五學年度起，三民主義、公民及現代社會三科將合併為「公民與社會」一科。（中國時報，2004.4.21：A2）

<sup>5</sup> 教科書開放一綱多本後，現行三民主義科的版本請見附錄一。

<sup>6</sup> 民國四十二年四月起，國立編譯館開始約聘專家編輯高、初中國文、公民、歷史、地理四科教

15) 從民國四十二年至六十年，近二十年的高中（職）主義教材雖未定於一，然除印刷、字體的設計略有差異外，教材內容大同小異。民國五十年代，普遍為高中（職）廣泛採用的主義教本有張鐵君編的《三民主義教本》、涂子麟的《三民主義課本》，及周世輔、熊惠民合編的《三民主義》。（周雪玲，1991：11）

根據周雪玲的分析，民國六十三年第一本統編本主義教科書與審定本明顯的不同如下（周雪玲，1991：13-14）：

- 1、反共教材增多、抗俄教材減少；
- 2、孫中山先生的原文與蔣中正先生的闡釋並重。審定本期之主義教材多取自中山先生著作原文，只是加以排列組合；部編本由於是國家機關（國立編譯館）掌握編輯大權，難免受到政治性干預，在「強人政治」態勢下，教材充斥政治領袖之言論，過多的詮釋與闡揚，使得主義教材在質、量兩方面均生變化，不僅內容份量大增，「蔣公說」、「蔣經國先生說」加上「編者說」使得純粹的國父「三民主義」思想變成好多人思想。
- 3、強調三民主義與實際生活的結合。統編本之主義教材除了理論之詮釋，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分別加上「民族復興運動」、「台灣的政治建設」、「台灣的經濟建設」作為主義施行之實證。究其內容，這些實證多半是政府執行之政策與成就之宣示，至於「理論」與「實際」之差距則絕口不提。

三民主義課本加入統一編寫教材的行列，是國民黨當局對民國六〇年代台灣面臨的一連串外交挫敗的反應之一。時值台灣退出聯合國，並與日、美斷交，外交上的連番失利引發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危機。為對抗國民黨宣稱代表中國的合法性逐漸被中共所取代的“國際逆流”，表現在三民主義課程上，是更強調要以三

---

科書，於同年秋自第一冊開始陸續供應，此為中學統一編印教材之開始。三民主義科則在民國六十年公佈新課程標準後加入統編本行列。（國立編譯館，1992:613）

民主主義加強民族團結，堅決反共決心，完成復國建國的任務。國民黨在民國六〇年代展開一連串針對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調查，表面上雖然宣稱三民主義教育已達一定成效，然而實際情形卻是意識到許多在台灣受過三民主義教育的學生，一至海外即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轉而成爲共產黨或台獨的支持者，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討高中「三民主義」與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課程的教學成效。就以民國六十四年高中三民主義課本爲例，特於討論民族主義部分增加「共黨利用民族主義的陰謀」一課，用以批判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批判「階級鬥爭」，以及最重要的批判「毛匪的海外統戰陰謀」。教科書內文說到：

近年毛匪在國際間叫囂「反帝」、「反修」、「支持第三世界」，對僑胞鼓吹「認同」、「回歸」、「統一」，這都是毛匪的統戰騙術；甚至散佈「和談」謠言，製造錯覺與幻想，以作為其統戰騙術之施展準備條件。（六十四學年版上冊：71）

書中並引蔣中正「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所言，指出此乃共匪「企圖利用民族主義之偽裝，污染海外同胞純潔的民族情操。」他說：

無可諱言，海外也有一些盲從者流，甚至一些知識分子，因受匪黨統戰的蠱惑，誤認共匪的虛矯的氣勢，乃代表「中國」之強大，是為中國人之「光榮」，且更誤認附和其所謂「認同」，即是「愛國」，而並不深思中國人究應選擇何者為正確之歷史道路？……（六十四學年版上冊：72）

這段文字很顯然是針對民國六〇年代由海外引發的向社會主義祖國認同的統一運動所做的回應。

此外，六〇年代正逢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時，台灣當局相對此則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以孫中山誕辰爲「中華文化復興節」。三民主義課本也自民國六十五學年起加入「三民主義與文化復興」一課。蕭阿勤認爲，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基本上受文革刺激的反應。蔣中正認爲，文革企圖毀滅中國文化，而復興文化的行動，正與之針鋒相對。對國民黨政權來說，所謂復興中華文化與反共，實爲一體兩面，復興中華文化就是反共，而反共就要復興中華文化。文復運動中，文化道統與政治正統的扣合，就在強調中華文化、三民主義、國民黨政

權三者不可分。進一步而言，因為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外交危機的加重，國共冷戰對峙因而益形尖銳，使國民黨政權對內對外宣稱統治的正當性，愈加迫切需要，於是使這些理念原本就沒能超脫的傳統思想模式，更趨鞏固而僵化。（蕭阿勤，1991：92-93）

統編本另一項為人詬病之處是遍及黨、政、學界的編審委員組成。江治華指出，民國六十一年成立之「高級中學三民主義科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委員人選大都由有關機關決定，不像其他各科由主任委員和國立編譯館共同決定，直到周應龍逝世後<sup>7</sup>，始由國立編譯館依據教育部所訂課程標準自行處理。（江治華，1993：145）江治華雖無言明有關機關為何，但亦可見三民主義確有不同於其他科目的特殊地位。統編本高中三民主義教材，從民國六十三年問世以來，迄至八十六年一月修訂四版為止，主任委員三易其人。<sup>8</sup>這些編審委員的組成，遍布黨、政、學界，自易引發爭議，例如黃惟饒就曾批評，在三十二位編審委員中，有編譯館人員、大學相關係所教授、教育部官員、政府相關單位首長、執政黨與救國團主管等。其中政府、黨、團首長的參與，很容易令人有「箝制思想」的聯想應與避免，而以純三民主義學者身分參與者比例過低也是一大缺點。就民生主義方面而言，三十二位委員中，較具經濟學者背景的，竟然僅魏萼一人，顯然太少。（黃惟饒，1993：265）

### 三、 三民主義課程的檢討

#### （一）教材的批判：

過去對高中三民主義教材的批判約可歸納為下列三點（朱謨，1993：20）：

---

<sup>7</sup> 周應龍自民國七十一年起擔任高中三民主義課本編審主任委員，同時期並接掌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期間推動包括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舉辦「中山學術會議」、創辦「三民主義研究通訊」等工作。他在接近解嚴前的一九八七年，還發言呼籲正視「國內正有人以『重新解釋三民主義運動』曲解三民主義，以『社會行動理論』給予社會暴力行為理論基礎的不正常現象，大家要加強發揚研究三民主義，擴大思想建設。」（聯合報，1987.9.21：2）「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為中國共產黨對三民主義的專用詞彙，顯見此時部分三民主義學者恐共、恐左情節仍揮之不去。

<sup>8</sup> 歷屆編審委員名單見附錄二。

1. 批評共產主義內容不夠客觀，用字遣詞流於情緒化。
2. 教科書中，除三民主義原典以外，引述政治偉人言論太多，而有超越三民主義真正內容。
3. 現實政治宣傳內容太多，已經脫離三民主義真正內容。

早期三民主義課本為服膺「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充斥著對共產主義、馬列思想及中國共產黨情緒性的批評，言必稱「朱毛奸匪」。在吳英荃所編《三民主義教程》中，即有「馬克思是以長年的積怨，發展為仇恨整個世界的主張，竟致一切學說推論，都建立在『恨』的基礎上。」之語句（吳英荃，1959：169）更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把人看作物，要人類回復到禽獸的境域，最後是叫人都變成機器……」。（吳英荃，1959：173）這種謾罵式的批評內容後來雖有改善，但三民主義課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仍是偏頗狹隘的。林玉體認為三民主義科的教學是企圖在學理上徹底的粉碎馬克思等的共產思想，並極端的攻擊中共政權在大陸上的錯誤政策，最後並以國民黨在台灣的「德政」為內容，以之作為光復大陸的楷模及促進世界和平的藍圖。（林玉體，1987：48）但根據一項針對高中三民主義教師的調查發現，教師認為「課本中對共產主義理論的介紹既膚淺又支離破碎，未能將馬克思主義與列寧、史達林的革命加以區分，又嚴重忽略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發展，獨自抱殘守缺的武斷批評。」（引自徐儷芬，1997：158）高中三民主義教材視馬列主義、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為「同位語」，一併批評。全文交互使用這些名稱，完全沒有考慮其間本質上之差異。對孫中山而言，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甚至馬列共產主義都有可資借鏡之優點，主義教材批評這兩種主義的方式值得商榷，與中山先生之思想亦不符合。（周雪玲，1991：71-72）

三民主義教科書的編寫大都是以孫中山講詞、著作為底，配合蔣介石的文章及闡釋而成，由於八十四年之前的三民主義課程標準皆明文指示，三民主義教學應補以蔣中正的著述，見諸各版三民主義教科書，其編輯要旨亦紛紛表明「本書立論，完全依據 國父遺教， 蔣總統言論，及中央國策。」（吳英荃，1959）

「本書立論完全以 國父遺教及 蔣總統言論為依據，並力求融會貫通，且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對每一問題，凡能引用 國父遺教或 蔣總統言論加以解釋者，均加徵引，俾使學生多讀原始文獻，以加深其認識。」(張鐵君，1963)「本書立論，完全以 國父遺教、 蔣總統言論，以及國家現行法令政策為準據，力求融會貫通。」(國立編譯館，1976)顯見蔣介石言論對三民主義教學的影響力。根據周雪玲的統計，三民主義教本資料來源 64%來自國父遺教，24.5%出自蔣介石言論。(周雪玲，1991：24)此外，彭立忠統計了七十九年版本高中三民主義課本內容出現的人物次數，發現除了孫中山占 59%之外，蔣中正出現的次數亦達 24%，蔣經國與李登輝出現的百分比則分別為 3.5%與 2%。(引自徐儷芬，1997：187)

究竟三民主義是否該收錄蔣中正的言論？朱謙認為，三民主義教科書應以引錄國父著述為限，不應如今日三民主義課程之教科書，引錄國父、蔣公、蔣經國故總統、李登輝總統歷代政治元首語句，幾近浮濫，活像是一本「名人語錄」。(朱謙，1993：19)反對三民主義教育的林玉體也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演講集深入淺出，且語多平易，所舉實例都有親切感。但一來國民黨當局選擇供給高中以上學生研讀的三民主義，很少是孫文著作之原文，許多都是節錄本、或引用部分語句而已，有失學生了解孫文學說的全貌。更令人不解的是一些有趣且甚富民主意味的三民主義精神，竟然在「三民主義」及「國父思想」的教科書上隻字不提。三民主義的精華不提，竟然只強調那些殘渣。把本來婦孺可知的三民主義弄得莫測高深。(林玉體，1987：49-51)而根據民國八十一年針對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等各級學校的專兼任三民主義教師所作的問卷調查，95.9%的教師認同三民主義教材之編撰應以中山先生的思想著述為主。(徐儷芬，1997：117)

另外，從過去實際調查數據亦可看出，無論教師或學生皆對三民主義教材的編寫方式不滿。根據李金振的調查顯示，高達 81%的師生認為高中三民主義課本有改寫的的必要，其中教師要求重新編寫的比例更高。對於三民主義課本將國父遺教及相關資料原文作片斷節錄，然後加以組合的寫法，僅有 13%的師生表示支

持。(李金振, 1981: 133) 黃人傑的調查研究也顯示, 三民主義教學缺失原因絕大部分跟「教材問題」有關, 其中又以「教材內容政治氣味太濃」, 「流於形式與口號並與現實嚴重脫節」兩項最受詬病。至少有 42.33% 的三民主義教師認為現行教材有嚴重缺點, 應該研究改進。(黃人傑, 1987: 130-131)

## (二) 三民主義師資問題

三民主義科過去在校園中享有特殊地位, 其教師素質良莠不齊向來為人所詬病, 政府官員、民意代表、黨工人員、退役軍人, 即使一無所長, 只要有關係, 有八行書, 便可弄得一個教席。(張亞漣, 1989: 71)。高中三民主義課程雖於民國四十二學年起正式教授, 但在民國五十七年師大「公民訓育系」<sup>9</sup>及五十一年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設置之前, 三民主義教師並無專系培養, 致無一定來源。根據民國六十四年教育部委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對中學教師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高中三民主義教師中, 受過正規中等師資教育的教師數, 僅佔全體高中三民主義教師數 11.83%。換言之, 高達八成多三民主義教師並未受過正規中等師資教育。此外, 就高中三民主義教師畢業之科系觀之, 畢業於本科系者(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或師大公民訓育系)也僅佔全體三民主義教師的 17.74%; 畢業於相關科系<sup>10</sup>者則佔 36.56%。亦即, 高中三民主義教師畢業於非相關科系者竟高達 45.7%, 幾乎是本科系者的三倍。反之, 本科系畢業的合格高中三民主義教師卻有九成以上沒有機會任教三民主義。(引自李金振, 1981: 41-42)

在張秀雄所做的調查中也發現, 高中(職)三民主義教師受過三民主義專業訓練者(指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與師大公民訓育學系的三民主義教育), 僅佔 24.8%, 而非三民主義專業訓練機構畢業者卻達 75.2%, 後者為前者的三倍。換言之, 有四分之三三民主義教師未曾接受三民主義專業的職前訓練。(張秀雄,

<sup>9</sup>師大「公民訓育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七年, 就童軍教育專修科改制而成, 當時係在各種因素妥協之下, 將公民教育、童軍教育、三民主義及訓育四個學術領域合併成為「公民訓育學系」, 是全國唯一培育中等學校公民、三民主義、童軍教育等科目師資, 及各級學校訓育人員之教育機構。

<sup>10</sup> 此處所謂相關科系係指畢業於大學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哲學、法律等系所。

1985：78-79)

民國七十六年黃人傑所撰「我國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與高中職三民主義教材適切劃分研究」專案研究報告亦顯示，高中三民主義合格教師只佔 53.34%，其非該科合格教師竟高佔 46.66%，情況相當嚴重。(黃人傑，1987：130) 該調查還發現，高中三民主義教師在師資結構分布上，就性別方面，男性有 545 位，佔 77.5%，女性 156 位，佔 22.2%。年齡分布上，若以 45 歲為中界線，則中界線前後各佔半數，似無老化現象。在黨籍部分，703 位填答人中有 646 位為國民黨籍，比例高達 91.89%。學歷部分，以大專院校畢結業者最多，共計 573 位，佔 81.5%，其次是具有碩士學位者，有 41 位，佔 5.83%。<sup>11</sup> (黃人傑，1987：98-102)

從上述調查數據可知，高中三民主義教師直到民國七十六年都仍存在近半數不合格教師。七十六年之後三民主義開始面臨廢考、廢教的壓力，各校更無可能重視此一問題，可見實施四十多年的三民主義教育，師資不良的問題始終存在。

#### 四、三民主義課程的挑戰

三民主義在解嚴後即面臨各界嚴峻的攻擊，高中三民主義課程更是眾矢之的，解嚴之後不斷有廢考、廢教三民主義的呼聲。過去三民主義教育是要達成「反共抗俄」、「反共復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時代任務，但自解嚴與終止動員戡亂後，反共無論在實質上或形式上都不再具有動員意義，過去與反共大業掛勾的三民主義教育也面臨嚴重的考驗。

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三日，立法委員陳哲男至大學聯考考場散發廢考、廢教三民主義的傳單，陳哲男指出在民主時代，三民主義硬排入高中學生的必修、必考課程，有違反時代潮流之嫌。如此箝制思想的工作，讓高中生在升學暴力下淪為犧牲品。(聯合報，1994.7.4：5) 十月四日民進黨立委黃煌雄主辦「大專聯考應

---

<sup>11</sup> 由於高中(職)三民主義教師人數不易掌握，此一研究以教育部於民國七十四年調查所得的教師人數核算，全國台澎金馬地區高中(職)共有專兼任三民主義教師 774 人，回收數為 703 位，推得回收率達 90.8%。

否廢除三民主義科目」公聽會，與會學者一致主張廢除大專聯考中的三民主義科目。十月五日民進黨與無黨籍共十位立委並聯手向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提案，要求作成大專聯考應廢考三民主義的決議。(中國時報，1994.10.5:2)十二月十四日，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表示，一本三民主義，頂多三個小時就可看完，不必花這麼多時間學習，大學聯招不考三民主義是件好事。(聯合報，1994.12.17:11)在種種廢考三民主義的呼聲下，教育部遂於八十三年底，請台大組成九人專案小組，邀大學聯招會共同討論三民主義是否列入大學聯招考試科目。台大所回收的三十五校意見中，有二十八校贊成不將三民主義列入大學聯招科目。(黃淑芳，1996:123)

不過這項建議案後來並沒有被教育部接受，引發贊成廢考三民主義一科的校長不滿，當時清大校長沈君山就表示，「尊重國父也不見得聯考要考三民主義，因為現在三民主義的命題，即使孫中山先生來考，也不見得及格。」沈校長這句話也暴露了三民主義科在命題上的不當，可導致對孫中山思想原意的曲解(黃淑芳，1996:124)民國八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大學校院校長會議再度討論大學聯招要不要列考三民主義一科，但由於贊成與反對的校長僵持不下，最後採取具過度性質的折衷方案，將三民主義總分由一百分降到五十分。(聯合報，1995.5.28:3)一直到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大學招生策進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始做成從八十九學年度起大學聯考廢考三民主義的決議<sup>12</sup>(聯合報，1999.3.27)。綜觀歷年來三民主義考科變化如下表所示：

表 2-3：大學聯考三民主義考科變化表

大學聯考三民主義考科變化表	
民國 43 年	大專聯考開始實施，三民主義考試時間為 50 分鐘，滿分 50 分，兼有測驗題及申論題。
民國 44 年	三民主義考試時間為 100 分鐘，滿分增至 100 分。

<sup>12</sup> 大學聯考雖做出廢考三民主義的決議，但截至目前為止，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在「社會」一科中仍包括三民主義。

民國 49 年	三民主義與其他考科考試時間皆縮短為 80 分鐘，滿分維持 100 分。
民國 62 年	所有考科改採電腦閱卷，三民主義取消申論題，全部為選擇題。
民國 65 年	三民主義恢復考申論題。
民國 85 年	三民主義考試時間縮短為 50 分鐘，滿分減至 50 分，全部為選擇題。
民國 89 年	三民主義廢考。

資料來源：民生報 1999.3.27：21

三民主義教育面臨的挑戰，主要與解嚴後教育自由化、民主化及本土化三項訴求有關。以當時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為例，其改革台灣教育制度的基本主張之一即是政治教材完全清除：廢除高中以上之三民主義、國父思想及軍訓等共同科目，軍訓室也一併廢除。（引自黃淑芳，1996：99）這些科目被視為是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是從事「思想」控制的教育，根本不適宜在學校中教授或存在。林嘉誠說：「任何一個民主國家，都不會將一個人的思想列為必修課程。」「高中也應該取消三民主義課程，大學聯考亦不應考三民主義，沒有測驗未成年人的政治思想的道理。」（林嘉誠，引自張亞濤，1989：57）林玉體也在所著《台灣教育面貌四十年》中，大力批判了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軍訓課程，以及與這些課程共生的校園活動與儀式，他認為三民主義式的黨化教育與日治時期皇民化教育同樣視教育為達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林玉體，1987：109）簡言之，隨著戒嚴體制的解除，台灣社會整體在思想上也力求解放。三民主義鑒於過去在學校教育、升學考試、國家考試，乃至於政府宣傳中的角色，在這種呼聲下，很自然地成為被點名批判、檢討的對象，將其視為台灣「多元開放的啓蒙教育」之敵，呼籲國人要「走出三民主義的樊籠」。<sup>13</sup>（傅偉勳，1990：105）

除了不夠「本土化」一項外，三民主義教育面臨的批判與國民黨在大陸時期

<sup>13</sup> 「走出三民主義的樊籠」一文發表於《當代》第 54 期，不過，傅偉勳在 1992 年 3 月《中山學術論叢》發表「孫中山思想學術研究改進暨發展課題試論」一文，開頭即澄清“走出三民主義的樊籠”標題為編輯金恆煒所加。傅偉勳強調該文並非專論三民主義或孫中山思想，而是藉著提出「多元開放的啓蒙教育乃是任何國家社會的文化創新需有的先決條件」這個論點的機會，順便批評了四十年來一成不改、墨守成規的三民主義教條而已。

所差無幾。這也說明了國民黨當局或者無能，或者無心讓三民主義教育擺脫政治力干預，成為獨立的、純粹的立國精神教育。三民主義雖已載明於憲法，理應不再是國民黨一黨的主義，但一方面由於三民主義確實是國民黨建黨以來“口頭上”奉行的主義，這種雙重身分，如沈宗瑞所指出的是「近代亞非地區建國黨與國家間難以釐清的課題，尤其當其國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其分際更顯得尷尬。」（沈宗瑞，1991：94）又加以國民黨向來黨國不分的執政作為，使三民主義終究難以擺脫一黨之私的形象。更關鍵的是，廢除三民主義教育是台灣國族認同轉向的一個象徵，在這種驅力下，三民主義鮮明的“中國”色彩反而成為沉重的包袱。

## 第二節 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課程

### 一、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課程變革

國民黨決定在台灣復行三民主義教學後，民國三十九年首先恢復大專「三民主義」教學，列為共同必修科目。相較於高中階段，大專院校的三民主義課程還背負著將孫中山思想學術化，發揚光大的任務。不過，根據袁世斌回憶指出，民國三十九年各大專學校重開三民主義的時候，原擬由政治系主持課程相關事宜，但政治系不願接受。「三民主義進不去一個學系，又給反對者一個好口實，詆毀它不是學術！三民主義教授因此便也『不算學人』！不屬於任何一個院系，分配不到一間研究室，也不配有一間放置三民主義圖書雜誌，以供閱覽的屋子！（袁世斌，1962：154-155）民國五十一年，袁世彬在〈專科以上三民主義教學的幾個先決問題〉一文中，依舊指出，對於大專院校是否該以三民主義為各院系學生必修課程，十年來不斷有人質疑，也常有社會名人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反對三民主義進入大專學校。他們所持的理由有四：（1）三民主義是國民黨一黨的主義，不能叫一般學生修讀；（2）個個青年都要學習三民主義，等於法西斯黨和

共產黨所搞的思想訓練；（3）大專學校除政治系、經濟系之外，一切院校都與三民主義無關；（4）三民主義只是一種政治主張，不是學術，不能進入最高學府。（袁世斌，1962：149）由此可見三民主義在大專教育中的尷尬地位，即便在戒嚴統治時期，對三民主義學術價值的質疑始終不散。早年因國家強制力的介入使其得以進駐與維持，但此舉並／反無助三民主義學術地位的建立。

民國五十三年，大專院校之三民主義改為「國父思想」，教育部認為此是：

鑑於反共戰爭，本質上就是思想戰爭，亦是主義與意識型態的戰爭，而「三民主義」又是戰勝共產主義唯一的思想利器；又大學教育為研究高深學問，養成專才為宗旨，大學課程當以注重學術思想研究為鵠的，所以通令各大專院校將「三民主義」課程名稱，正式改為「國父思想」。（引自黃人傑，1987：25）

改為國父思想之後，教育部一方面加重對此課程的教學指示，另一方面則是更為積極的展開「三民主義學術化」的工作。

大專國父思想課程不若高中三民主義，有課程標準或規定統一使用的教科書，但自五十六年開始，教育部對國父思想教學公佈了數次「講授大綱」，雖沒有強制性，但期望各教授能夠依照這個大綱來上課。民國五十六年教育部第一次公佈「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講授大綱」，此次大綱公布後所出版的代表性書籍有：吳寄萍所編「國父思想基本教材」、蔣一安的「國父思想論」、王昇的「國父思想」以及周世輔的「國父思想要義」（陳延輝，2002：42-43）。民國六十三年教育部再次公佈「專科以上學校 國父思想講授大綱」，此一講授大綱係根據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七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修正備案之「加強 國父思想教育與匪情研究實施計劃」及「當前加強思想教育及組訓工作實施要點」兩案修定而成。根據此一講授大綱，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特地聘請馬璧、涂子麟、林桂圃、吳演南、周世輔等人執筆撰寫「專科以上學校國父思想講授大綱教學參考資料」<sup>14</sup>（教育部訓育委員會，1975）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七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頒布「加強

<sup>14</sup>各人撰寫篇章如下：馬璧「導論與結論」、涂子麟「民族思想」、林桂圃「民權思想」、吳演南「民生思想」、周世輔「哲學思想」。

國父思想教育與匪情研究實施計劃」，其主旨曰：「為配合當前革命情勢之要求，應加強國父思想與匪情研究，駁斥共產邪說與揭發共黨暴行，鞏固防共心防，強化思想作戰。」該計劃的實施要點七點，多是強調加強對匪情的研究，俾以三民主義批判之，並指示改進大眾傳播單位匪情資料運用辦法，對各報社、通訊社、電視台及廣播電台等傳播單位有計劃交付任務，使其能有效運用匪情資料，強化反共思想教育。此外，為改善國父思想師資，此計畫在師資部分指示（引自江義德，1981：247-248）：

1. 設置 國父思想講座及研究補助費名額，獎勵對於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有基礎之學者，從事 國父思想之研究與教學。
2. 國父思想除現有教師外，如新聘教師，應以三民主義研究所畢業生及第一項學者為原則。

民國六十五年教育部第三次公佈「專科以上學校國父思想講授大綱」，強調此次修訂之講授大綱「特別著重青年中心思想之建立，和加強青年精神之武裝，因此本教材特別重視各種主義之比較和匪黨主義之批判。」要點中規定本課程之講授除以國父原著及蔣中正有關闡揚國父思想的訓詞為基本資料外，教師亦可選擇有關國父思想之優良著作，作為補充教材。教育部並特聘吳寄萍、林有土編撰「國父思想教學表」，於六十五年六月出版，分贈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國父思想課程教師參考（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1455）。民國六十九年則是教育部第四次，也最後一次公佈「專科以上學校國父思想課程教學要點」。

綜觀教育部歷次公布之教學大綱，用詞雖有不同，實質內涵則無太大差異。陳延輝認為，這些講授大綱都犯了時間和空間的混亂。在時間上停留在過去，並且以虛幻的中國為論述對象，無視台灣實際的政治現實。（陳延輝，2002：57）

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中，教育部宣佈將「國父思想」科目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黃淑芳，1996：128）並自八十二學年度起正式實施。民國八十四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380 號解釋案，指出大學共同必修課程違憲，自此「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課程轉變為「通識課程」

的民主與法治等各種課程，大專院校中的三民主義教育宣告走入歷史。(陳延輝，2002：34)

## 二、大專國父思想課程教育成效、教材、師資調查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國民黨舉行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案」。在這次會議召開前，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特於五月間舉辦了「大專院校三民主義教育成效調查」，以全國各大專院校在校學生為調查母體，隨機抽出三千四百個學生做為樣本進行調查分析，是歷年來較大規模的調查。調查項目除了國父思想教學本身的檢討外，還包括一般思想教育的檢討，後者意在檢討相關的教學活動、課外活動能否配合三民主義的教育目標。根據此一調查研究發現，國父思想的教學，就各項教學目標的實現而言，成效令人滿意。此處所謂教學目標係指「堅定對三民主義的信仰」、「認識共匪的邪惡罪行」、「認識我國固有文化的博大精深」及「認識青年人所負的責任」四大項目而言，學生反應「很有幫助」與「相當有幫助」的比例合計超過七成。(教育部，1976：7)相較之下，學生對教學活動與師資部分的評價，顯然不夠理想。對師資不滿意及不太滿意者共佔 39.8%；對教材比重不滿意及不太滿意者合計 41.8%；對教材編排不滿意及不太滿意者亦高達 41.6%。與此研究其他部分相較，學生對師資與教材滿意度的確偏高。(教育部，1976：20)此外，該調查也針對三民主義教學應加強哪一項內容比重進行詢問，結果發現大專青年主張應加強民族主義者比例(41.6%)最高，加強民生主義者(36.7%)次之，加強民權主義者(12%)較低。何以主張加強民權主義者比例大幅落後其他兩者？該研究對此的解釋是「政府在台灣早已推行地方自治，人民在憲政的體制下，享有各項自由平等的權利，因此可能促使增加民權主義研究之動機不很強烈。另外一方面，目前大有為的政府正在奮發圖強，加緊國家建設，俾在國際逆流中為國家民族開創新機運，隨時準備反攻復國，因此，青年切身感受民族與民生主義的重要，而對這兩方面的研究動

機可能比較強烈。這可能是何以青年學生多數人要對加強民族民生兩主義教學比重的主要緣故。」(教育部，1976：36)這種解釋實欠缺說服力。民國六十五年台灣尚處戒嚴時期，民權主義不受重視應是肇因於現實因素。

民國六十七年，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再次針對大專院校國父思想教學現況展開調查(此調查為民國六十五年「加強三民主義思想教育功能案」之執行計劃之一)，規模更加龐大，調查對象包括全國大專院校任教國父思想課程之全體教師四八八人，以及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六千人為樣本。(程運，1980：57)在教學目標方面，此一研究分別就「瞭解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義及其實施情形(21.9%)」、「能比較分析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的異同與優劣以建立三民主義的思想和信仰俾批判共產主義及其邪說(37.3%)」、「認識三民主義復國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以加強反共復國的決心和實踐(23.4%)」、「瞭解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我國家民族的豐功偉業(5.3%)」、「發揮三民主義思想教育的功能，使之融會於各種學科之中(5.4%)」、「效法國父忠愛民族的犧牲奮鬥精神(3.5%)」六大目標加以調查，結果以前三項獲得較高學習效果。僅以教學目標觀之，不論是六十五年或六十七年的研究，對教學目標的設定明顯流於保守、空洞。

課程教材調查部分，由於此研究並無直接詢問對國父思想教材的滿意度，故無法得知師生確切滿意程度。大專國父思想課程無指定教材，但教育部仍希冀國父思想教學能依據教育部頒定的講授大綱進行。根據此研究調查發現，目前大專院校教師講授國父思想所採用的教材，大部分都能「照部頒講授大綱」講授，其平均百分比為53.1%，居最高位；其次就是「學校規定教材」，百分比為37%，列居第二位；再次是「自編教材」自由講授，其百分比佔7.7%；「照國父原本教材」講授，其百分比佔2.2%，為最低<sup>15</sup>。(程運，1980：73)

在大專院校國父思想師資部分，也存在與高中三民主義教師一般師資不良的

---

<sup>15</sup>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起，《新知識雜誌》曾以連續十期(第九十九至一〇八期)的「社論」大聲疾呼「國父思想」應採國父原典教學。然而，他們所顧忌的是「那些滲透(潛伏)在教育部或各大學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任卓宣及其同路人)」，因而主張唯有採用國父原本教學，才能杜絕「思想走私」的可能。

問題。根據前引研究調查，各大專院校六十七學年度國父思想教師之最高學歷及其資格審查的情形如下：

從教師的學歷來看：在全國 531<sup>16</sup>位國父思想教師中，三民主義研究所畢業者有 81 人，佔全體教師的 15%，相關研究所畢業者有 62 人<sup>17</sup>，佔全體教師的 12%，其他研究所畢業者有 32 人，佔全體教師的 6%，相關科系畢業者有 248 人，佔全體教師的 47%，其他科系畢業者有 80 人，佔全體教師的 15%，未受高等教育靠自己努力進修由高中教師升任者，有 28 人，佔全體教師的 5%。

從教師資格審查的情形來看：經教育部教師資格審定合格者有 357 人，佔全體教師 67%，未審定合格之教師有 174 人，佔全體教師 33%。而在未審定合格之教師中以兼任教師為最多，有 105 人，佔全部未審定合格教師 60%。即每五位國父思想專任教師中，就有一位未經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師，其中又以私立大學、專科學校最多，未合格教師比例超過四成。這些尚未審定合格之教師，在私立大學大部分為黨務高級工作人員，在私立專科則大部分均是學校為節省經費，遴聘一些剛從大學畢業未具講師資格者。(程運，1980：212-214)

除此之外，此調查亦發現各大專院校教師每年發表有關國父思想方面的論文或著作以發表一篇之教師為最多，佔 42%。其次是從未發表有關國父思想之論文者有 22%，即五人中有一人從不研究寫作發表論文者，其比例實屬驚人。再其次就是每年發表三篇論文以上者，其比例佔 21%，最後為每年發表兩篇者，比例為 15%。(程運，1980：216)

國父思想課程師資問題在民國七十二年的調查研究中，已見改善。各大學國父思想教師任用三民主義研究所或中山學術研究所畢(肄)業生擔任的比例逐漸增加。(陳漢英，1985：163) 民國七十四年朱謨調查了全國 504<sup>18</sup>位國父思想專

<sup>16</sup> 該書頁 57 曾說國父思想教師人數為 488 人，作者並無解釋何以有此差異。

<sup>17</sup> 此處所謂相關研究所意指：政治、經濟、哲學、社會、法律、教育、國文等研究所，修習三民主義研究所相關課程及學分達規定者。(陳漢英，1985:41)

<sup>18</sup> 在此一研究問卷調查表寄發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曾就各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課教師預作先遣調查，函請各大專院校教育處提供各專兼任教師名冊、教課時數及其他相關資料。經過整理，減除兼任兩校以上，姓名重複出現者外，統計得專兼任教師 504 位。

兼任教師師資結構分布發現，在性別方面，男性教師有 456 位，女性 40 位，8 位未填列性別。(朱謨，1986：9) 就年齡而言，大專院校國父思想師資在 44 歲以下者，佔 32%，45-59 歲者佔 22.4%，60 歲以上者佔 41.5%，顯示國父思想教師年齡的分布略嫌老化。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教師共有 209 位，其中六十五歲以上者有 115 位。(朱謨，1986：20) 學歷部分，大專院校畢業以上程度教師有 239 位，佔總教師 47.4%，碩士級程度有 211 位，佔 41.9%，博士級教師有 27 位，佔 5.4%。碩士級國父思想教師人數增多，是三民主義研究所設立的成果。(朱謨，1986：21)

另外，在專兼任國父思想教師資格方面，填答問卷教師中 138 位為專任教師，佔 77.5%，專任教師中經教育部審定者為 117 人，佔 84.8%；兼任教師 40 位，經教育部審定者有 27 位。綜合言之，專兼任大專國父思想教師未審定合格教師有 23 位，比例為 12.9%。(朱謨，1986：23-24) 此一數據顯示，合格的大專國父思想教師比例較前期大幅提高，惟此調查在國父思想教師部分回收率偏低，僅達 35.3%，未知是否影響可信度。此外，國父思想教師黨籍分布方面，96.6% 的教師為國民黨籍。(朱謨，1986：21)

此研究針對國父思想教材的調查發現，重編國父思想教材時，有 34.66% 的教師主張應兼顧「學術性」的課程特質為最優先；其次有 29.55% 的教師主張以「思想性」為第二優先；再其次有 27.27% 的教師主張以「教育性」為第三優先，有 22.16% 的教師主張以「政治性」為第四優先，有 27.27% 的教師主張以「社會性」為第五優先，有 35.23% 的教師主張以「信仰性」為第六優先。(黃人傑，1987：242) 可見國父思想教師贊同提高課程的學術性，而不贊同以「信仰性」來主導課程。

### 第三節、三民主義研究所

#### 一、三民主義研究所成立

民國五十年，教育部組成十四人小組「三民主義考察團」，前往全國十三所公私立大專院校實地考察，提出重要改進建議五點，其中第一點為關於三民主義教學的師資方面，建議：要設置特殊機構，培養三民主義教學人才。減少兼任教師，多設專任教師以便加強學術研究。（程運，1984：30）三民主義研究所之設立，其宗旨或謂提昇高中（職）三民主義課程師資水準，或謂培育大專國父思想課程師資，或謂培養三民主義理論研究與實踐人才，或謂培養中堅行政幹部。（程運，1984：4）在這些宗旨之下，首先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者為民國五十一年成立的私立中國文化研究所。該所以建立三民主義新學府為建校基本理想，設立了由三民主義學門領銜之下的十二學門。翌年，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成立，研究所仍維持現狀。迄至民國五十三年，中國文化研究所三民主義學門正名為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程運，1984：30-31）

民國五十七年，教育部函聘崔載陽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主任，指示增設三民主義研究所，其主要目的在培養三民主義學術理論與實踐人才，以及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課程之師資。民國六十年教育部頒訂「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其實施辦法在大專院校部分亦明訂：選擇適當之大學，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以宏揚三民主義之學術研究。（程運，1984：33）民國六十二年三月間，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核定了「加強國父思想教育與匪情研究實施計劃」，決定有計劃的培植三民主義講師，中央研究院、台大、政大等學術教育機關將設置三民主義研究所，就是計劃的一部分。（聯合報，1973.10.24：2）在這些指示下，民國六十三年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同時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特別的是，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在體制上，最初直屬校長室，自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一日起，改隸於法學院。（程運，1984：34）最後設立者為民國六十九年中山大學設

立之中山學術研究所，由於一開始即不以「三民主義研究所」為所名，因此解嚴之後當各三民主義研究所紛紛尋求改名、轉型之際，該所得以避開三研所改名所可能引發的不論是意識型態上或學術資源分配上的不便。<sup>19</sup>

除了成立碩士班之外，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六年增設博士班，政治大學則於民國七十五年增設博士班，台灣大學及中山大學於民國七十七年增設博士班，台灣師範大學則於民國七十八年增設博士班。

## 二、三民主義研究所轉型

民國七十三年中央研究院第十六屆院士會議期間，有院士建議為了「便利國際交流」希望改名，這是三研所最早的改名聲音。由於國外學術機構對三研所的性质不明瞭，容易誤解為政府的宣傳機構，加以歸國學人對三研所的學術純度感到疑慮而不願加入，更重要的是，解嚴後三研所的預算在立法院遭到反對黨杯葛，使改名有了「迫切感」。(自立晚報，1993.1.29：5) 民國七十九年中央研究院首先將「三民主義研究所」改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sup>20</sup>，是三研所改名最早的學術單位，自此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亦紛紛醞釀更換招牌。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正值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國家解體之際，一時之間「去意識型態化」蔚為國際風潮。原共產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大都改名為「政治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學院也改成「政治學院」。(中國時報，1993.3.22) 對照當時台灣內部亦正進行著一波波的民主改革運動。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的解體，是台灣民主化的國際歷史結構動因。(曾建元，1998：10) 三民主義研究所的改名似乎也呼應了國際間「去意識型態化」的潮流。台灣大學於民國八十年即提出改名申請，期間曾以包括「國家發展研究所」、「社會科學整合研究所」及「亞太研究所」為名申請改名，但均失敗。(葛永光，1998：1) 直到民國八十九年才

<sup>19</sup> 除此五所大學院校外，另有民國七十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以及民國五十七年政治作戰學校設立政治研究所，內轄三民主義研究組，首任所長為任卓宣。

<sup>20</sup>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院在民國九十二年二月更傳出在中央研究院整併風下，要首先遭到裁撤的消息。(中國時報，2003.2.20)

正式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不過，早在民國八十年，台大三研所的英文名稱就已改為「國家發展研究所」，對外行文及名片都是用這個名稱。不僅如此，民國七十九年，台大三研所首度採取分組教學，將課程內容分為「憲法與政治發展」、「法律與社會變遷」、「經濟發展與政府角色」、「社會發展與政策」及「大陸研究」等五大學程。八十學年度起，更以「國家政策研究組」及「大陸問題研究組」兩組招收新生。(陳春生，2000：4) 可以說早在三研所正式換招牌之前，其課程與研究範圍就已超越「三民主義」範疇，趨向「科際整合」的研究方向。由黃惟饒與黃淑芳的研究亦顯示出三研所研究脫離孫中山思想的傾向。根據黃惟饒的統計發現，民國七十八年之後，各三民主義(中山學術)研究所學位論文呈現與孫中山思想「漸行漸遠」的現象。(黃惟饒，1999：206) 黃淑芳分析了民國78-83年的研究生論文也發現，除了師大三研所學生較多與中山思想研究有關外，其餘各所則甚多已偏離三民主義。(黃淑芳，1996：136)

繼台大於民國八十年首度提出改名申請後，政治大學亦於民國八十一年提案改名，先以「中山學術與國家發展研究所」申請改名，但遭教育部以「國家發展」名稱涉及範圍太廣為由駁回。(黃淑芳，1996：134) 直到八十三年才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另外，文化大學在八十一年八月一日正式更名為「中山學術研究所」。師範大學則於民國九十二年改為「政治研究所」。

表 2-4 台灣高教機構三民主義研究所基本資料

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成立、改名時間				
所名	成立時間	成立宗旨	首任所長	新改所名
文化大學 三民主義 研究所	51 年成立 碩士班 56 成立博 士班	1.研究發揚憲法「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立國之理論與精神。 2.研究三民主義與國家建設及反共救國之實際問題，使三民主義之研究對黨國有所貢獻。 3.為國家培養革命建設人才，並為大專學校及高中培養「國父思想」及「三民主義」之師資。	羅時實	81 年改名為「中山學術研究所」

		4.發揚三民主義之理論，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開創新的境界，進而宏揚三民主義於國際，以填補現代思想的真空，糾正現代思想的歪曲，開創三民主義世紀的文明。		
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57年成立 碩士班 78年成立 博士班	1.致力於我立國方針三民主義之科學研究與發揚。 2.從事對國父思想與近代學術之比較研究，與融會貫通。 3.根據國父思想，切實研究近代歷史發展的必需途徑，與當前實際問題的正確解決。 4.培養三民主義的學術人才，及專上學校「國父思想」課程的優良師資。	崔載陽	92年改名為「政治研究所」
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63年成立 碩士班 77年成立 博士班	1.宏揚三民主義之立國精神，研究三民主義之學術理論及國家建設之實際問題。 2.培養黨政人才及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課程之師資。 3.發展成為一個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整合研究之中心。	姚淇清	89年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63年成立 碩士班 73年成立 博士班	1.培養三民主義與國父思想課程師資。 2.造就宏揚主義學術理論研究人才。 3.培養黨政各階層幹部。	吳寄萍	83年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69年成立 碩士班 78年成立 博士班	1.闡揚中山先生之學術思想。 2.配合國家建設之實際問題，從事社會科學之整合研究。 3.培養研究中山學術思想之專門人才。	朱堅章	創所即以「中山學術研究所」為名。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考程運（1984）「三民主義研究所現況、改進及發展」，頁 30-36。

### 三、三民主義研究所調查

過去以三民主義研究所為對象之調查研究並不多見，民國七十三年由程運、邱有祿、蕭行易等人所撰之《三民主義研究所現況、改進及發展》針對三民主義研究所之報考資格、課程設計、師資陣容、圖書設備、論文與就業等五方面，以問卷調查方式，調查了三民主義研究所教師 43 人、研究生 303 人與暑期在職進修班學員 376 人，共計 722 人。(程運，1984：52)

在師資基本資料部份，三民主義研究所教師，獲有博士學位者佔 46.5%，碩士學位者佔 30.2%；教師中 86%均經教育部資格審定；就年齡而言，五十歲至六十歲者最多，佔 37.2%；就黨籍言，97.7%為國民黨籍。(程運，1984：76-77)

在課程設計滿意度方面，教師選答「滿意」者佔 58.5%，「尙滿意」者佔 31.7%，「很滿意」者佔 9.8%。研究生反應略有不同，以選擇「尙滿意」者最多，佔 44.2%，「滿意」者佔 34.9%，「不滿意」的比例為 13.8%，「很滿意」則有 7.0%。整體而言，學生對課程的滿意程度略低於教師。若以修業學校校別而言，三研所學生對本所課程設計滿意度以中山大學居首，其他依序則為政戰學校、師範大學、政治大學、文化大學、台灣大學。(程運，1984：116)而在教師授課內容滿意度方面，研究生對於教課內容之反應偏向否定。「略淺近」和「尙滿意」共計 62.0%，「很充實」和「很適當」共計 38.0%。而就修業學校別，同樣以中山大學滿意度最高，大幅領先其他學校。(程運，1984：122)

在論文與就業部分，畢業論文性質屬於哲學類者佔 11.1%，屬政治學類者佔 38.9%，經濟學類佔 20.0%，社會學類佔 12.8%，其他佔 17.2%。(程運，1984：148) 在就業方面，根據此次調查，三研所畢業生從事「教師或教育行政人員」最多，佔 52.3%；「一般行政人員」居次，佔 25.9%；另有 8.1%從事「黨團」工作，6.1%擔任「學術研究人員」。

#### 第四節 三民主義學術化的問題

早在民國三十九年蔣介石在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九期舉行的開學典禮

上即指示：「本院今後要負起責任，約同其他有關教育機構，從速著手編訂三民主義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三民主義的辯證法，邏輯學等等重要的書籍來實現三民主義教育思想。」(崔載陽，1970：344)民國六〇年代開始，教育部更爲積極地展開三民主義學術化的工作，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設置了「三民主義學術研究基金會」，由政府依預算程序撥足基金新台幣一億元，運用所生孳息辦理各項獎助事宜，包括(黃淑芳，1996：110-111)：

- (1) 三民主義學術研究之獎助
- (2) 三民主義學術著作之獎助
- (3) 三民主義學術著作譯介之獎助
- (4) 三民主義學術研究人才進修之獎助
- (5) 三民主義學術研究闡揚出版事業之獎助
- (6) 三民主義學術研究社團之獎助
- (7) 三民主義學術研究闡揚國際推廣活動之獎助。

雖然國民黨當局很早就注意到必須從事三民主義學術化的工作，但無可諱言，這項動機有爲與共產主義相抗衡的政治考量，是爲「駁斥共產邪說」而作。這種政治與學術的糾結正是三民主義學術化的困難之一。陳其南認爲，孫文在中國社會和一般知識份子的心目中，比較常被視爲是一個政治人物或革命運動家，而較少從學術性的客觀立場來探討其思想。這兩者是互爲因果的。尤其在訓政和戒嚴時期，要從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術研究角度來探討孫中山思想，恐怕將立即成爲體制下的犧牲者。(陳其南，1998：237-238)

沈宗瑞從意識型態發展的角度分析，他認爲原來三民主義的內涵在晚期多少受到列寧的影響，而國民黨的組織結構更深受影響，然而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退台灣後，在國際對峙的體系中，由於隸屬美國的自由陣營之下，因此在後來三民主義的解釋也就受到美國文化相當程度的規範。(沈宗瑞，1991：91)一九六〇年代以前三民主義的功能，主要是作爲「檢查」、「灌輸」與「指導」之用，台灣作爲美國西太平洋防線中的一員，三民主義在此發揮了防止赤化的功能。當時

三民主義的研究取向，主要是基於國家反共與建設政策的需要，以「反共產主義、鞏固思想心防」，「建立哲學體系」，「聯繫中華文化與三民主義」三者為研究重點。不過，一元化的解釋，學術與政治界線不明，以及為比附共產主義理論，冀圖建構一套哲學體系與之擯抗，而對孫中山思想諸多牽強附會的詮釋，則是此時期的主要缺失。一九七〇年代之後，隨著台灣政治社會結構的轉變，三民主義意識型態的角色扮演也起了變化。第一，國民黨領導階層的意識型態色彩，已逐漸淡化；第二，由於社會政治環境改變，使得三民主義必須重新詮釋以符實際，三民主義漸成為政策合理化與合法化的工具。第三，此時期的三民主義學術研究逐漸放棄大型（哲學）理論的建構以及「以經解經」的方式，改而落實到較為具體的實踐及政策問題。簡言之，此時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的態度已從指導發展的「主體」，轉變為一種工具性的「客體」，逐漸淡化三民主義的「信仰」色彩。（沈宗瑞，1991：96-100）

另一個影響三民主義學術化的因素內在於孫中山思想中，也就是究竟孫中山思想是否具備學術研究價值的爭論。過去三民主義曾被共產黨譏為「雜貨攤」，吳稚暉則指為「集大成」，（引自湯承業，1989：119）解嚴後趙天楫則說：「國父思想，是香火，不是學術。……它實在沒有太多的研究價值，它只有維繫統治需要的工具價值，在那些越把它視為工具價值的地方，他的思想真貌就越被隱藏著，所以，在海外的中國研究學界、在大陸，對孫中山早有公正的了解，但在台灣，孫中山是最被誤解的地方。」（趙天楫，引自蘇嘉宏，1993：70）此言一方面否定了研究孫中山思想的必要，但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點出一直以來“國父遺教”在台灣如何被誤解，被畸形地呈現著。

無論如何，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確試圖為孫中山思想建立某種學術體系。根據劉阿榮的分析，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三民主義學術研究的重點和取向，大致可以區分為兩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約為民國四〇、五〇年代，研究的主題大致以建構一套「國父思想體系」為重點，研究方法則偏重在「以經解經」（以國父及蔣公之言來闡明和建立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劉阿榮，1989：

765) 此時的研究者大多是國共戰爭後離鄉背井來台者，他們研究、闡發三民主義是爲了抵抗共產主義，因此多半亦是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有所涉獵者。(劉阿榮，1989：771) 然而，此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難免偏頗，洪鎌德批評，反共抗俄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其著作特色爲權充反共、批共的理論鼓吹手，是國共兩黨意識型態鬥爭中，替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尋求正當化、合理化的辯士，也是針對中共的奪權建國，及其支撐的馬列主義嚴加批駁否定的官方、或半官方「政論家」(意識型態家 ideologists)。(洪鎌德，1996：142-143)

此一時期研究最大的特色莫過於想把三民主義的整個學術體系建立起來，有的是以全部「國父遺教」爲範疇，也有專門偏重於國父的某方面思想而立論。前者如葉青「三民主義概論」、傅啓學「三民主義大綱」、「國父遺教概要」，後者如林桂圃「民權主義新論」、楊幼炯「國父的政治思想」、羅時實「民生主義新論」、何浩若「民生主義與自由經濟」、任卓宣「民生主義真解」等等。這時期的研究大抵因應各大專院校「國父思想」課程教學之用，因而以「國父思想」爲名稱者佔大多數，而其內容則「編」多於「著」，且各書間相互因襲模仿者特多，除少數著作有其良知創見之外，大都無法登於「學術研究」之堂，是故在這一、二十年間，「量」的成長雖然十分可觀，而「質」之提高卻無太大功效。(劉阿榮，1989：765-767)

採取以經解經的研究方法，在缺乏言論自由的時期或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不過，這種方法畢竟無法對三民主義學術研究產生太大突破。殷海光曾說過，「近十幾年來，對於三民主義研究得最努力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任卓宣先生。可是，他所走的路是鑽到三民主義裡面加以詮釋。這種工作，類似中世紀的煩瑣哲學家之註解亞理士多德哲學。這種路線越走越窄。所以，三民主義的煩瑣哲學，到了任卓宣先生便是登峰造極，不能再有進境了。」(殷海光，1971：584)

第二時期爲民國六〇年代之後，研究主題大致繞在「三民主義學術化」或「學術三民主義化」的範疇中，研究方法則以一般社會、人文科學來詮釋三民主義。(劉阿榮，1989：765) 此時期受到國際學術思潮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逐漸走

向重視科學的實證研究，三民主義研究逐漸放棄巨型周遍理論的建構，轉入中型或更微量模式的試探，喜歡以西洋「學術名詞」來關照、詮釋中山思想，而且採取比較動態的研究，並偏重於實證方面的分析。(劉阿榮，1989：771-772)

過去三民主義學術化成效如何？持否定看法者，如陳延輝認為三民主義學術化的工作並沒有獲得成效，過去不論是三民主義政治學、三民主義經濟學、三民主義教育學或三民主義哲學等著作，在各自的學術界並沒有太大影響力。他以馬啓華所著《三民主義政治學》為例，指出該書的編寫一方面為符合政治宣傳而有許多不符學術規範的詞句。另一方面，就內容而言，真正論及孫中山政治觀念的部分，不到全書的十五分之一，這對三民主義學術化根本沒有作用，也不能算是一本所謂三民主義政治學的學術論著。陳延輝認為想建立一個全面的「三民主義學」是不可能的，反倒是以社會學或政治學出發來討論孫中山思想有關的主題，是比較正確的研究方向。(陳延輝，2002：62-63)

然而後一研究取向並非全無疑慮，它也可能造成三民主義研究「失真」或陷於支離破碎。(劉阿榮，1989：773) 陳儀深與劉阿榮(1987)在所編《孫文思想的理論與實際—參考資料選輯》初版序中指出，隨著台灣的內外環境變遷迅速，文化界蓬勃發展，對於孫文思想的研究，應該是形成「新典範」的時候了。他們並很前瞻地提出以「孫文思想」替代「國父思想」，以矯正過去孫中山被過度神化的弊病。這種去神化的步驟確實是形成新典範的第一步，如許雅棠所言，「那些附著於先生思想身上的官學色彩的逐漸淡薄應該是先生思想和行動研究者的最大喜訊。」(許雅棠，1989：186)。隨著政治威權體制的淡化，去除政治力的干預後，考驗三民主義學術研究的將是其是否具有貨真價實的思想內涵。